

回忆录专辑

(第二辑)

高士秀与宁夏辛亥革命

郭连成撰述

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

党史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印

高士秀与宁夏辛亥革命

前 言

辛亥革命，宁夏民军起义，在西北地区来说，规模较大，持续的时间较长，对于打击西北清军残余势力，牵制清帝偏安西北，彻底推翻两千年的帝制，起着重要的作用。但正史无记载，现有文字史料，说法各异，《朔方道志》竟把宁夏辛亥革命起义，诬成“会匪乘机作乱”。把民军光复宁夏的革命行动，诬成“逸匪窜乱”。至于高士秀寄居陕北，一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，进而发展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参与反蒋救国的进步事迹，更少记载。

本文撰者连成，追随高士秀多年，间余时间，士秀口述，连成执笔，撰述了宁夏辛亥革命有关资料，可惜，原稿毁于十年动乱之中。现应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征集文史资料的需要，经连成重新回忆撰述，苏复涛参照地方志整理，孔建平协助，立成本初稿。因限于水平，错误难免，请知者指正。

一、高士秀家世与“贺兰山堂”

高士秀，字志清，宁夏银川市人。祖籍陕西定边县。1876年出生于银川。幼时家境贫寒，以农为业。因无钱读书，喜爱武术，以舞剑出名；身体魁梧，善骑射，广交结友，好扶危济贫；鄙视贪官污吏，崇尚义侠，积极参加帮会活动。辛亥革命时，他已壮年（三十七岁），臂力过人，举重摔跤，乡里无人能敌；能越高墙，武功精深，会众敬佩为府城“英豪”。

高士秀是宁夏辛亥革命重要领导之一。由于宁夏辛亥革命会党起义，被清军镇压。民国建立后，北洋军阀马福祥父子长期盘居宁夏。他客居陕北榆林达三十多年，为图光复宁夏而百般筹措，于1941年12月病逝，享年六十六岁，葬于榆林城南金剛寺后。葬礼由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主持。墓碑曰：“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骑兵师长高士秀将军之墓”，并略记述了生平事迹。

宁夏地区的哥老会，始于清末，因湘军入甘，镇压金积堡马化龙回民起义，把南方的帮会组织传到宁夏。“洪帮”和海外的“洪门”，四川的“袍哥”，同属群众性的政治团体。所谓“洪帮”是指洪朝后裔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）“怀念明室，扫除鞑虏”之意，以联络群众，“反清复明”为目的，进行秘密活动。他们的暗语称“海底”，意革命成功之艰巨。会众以兄弟相称，堂规纪律严格，对话都用暗语，各地帮会相互都有联系。

清末光绪年间，由于慈禧篡政，清廷更加腐败，对外签订许多卖国条约，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，洋人有“治外法权”，

任意欺压中国人；对内则镇压爱国军民，增加赋税，贪官污吏趁机加码勒索，民不聊生，全国各地都相继秘密发展了反满清的革命组织。

宁夏河套地区，素有“塞上江南”之称。外国传教师于清末就渗透到这里。当地各族群众，不但受清王朝封建官吏的剥削和奴役，而且还受外国人的欺压和敲诈。洋人依仗权势，以收买为名，强占民房土地，修建教堂，开辟种植园，群众称“洋园子”，他们引种鸦片，搜刮民财，并贿赂地方豪绅，引诱不良之徒，加入天主教，愚弄乡民，欺压百姓。清朝官吏，惧怕洋枪、洋炮，不敢为民做主。他们甚至相互勾结，在通衢重镇，如磴口、石嘴山、吴忠、银川、宁安堡、中卫等地开办洋行，压低价格，收购皮毛、发菜、枸杞、甘草等土特产，垄断出口贸易，排挤地方商贾，使富饶的黄灌区人民生活反而极端贫困。宁夏地方的回汉群众反满清、反洋人的思想情绪日益高涨，在通衢大邑如：银川、平罗、灵州、中卫等地，秘密结社，建立帮会组织，有些散兵游勇，甚至士、农、工、商纷纷参加当地帮会组织的活动。当时在甘肃、宁夏境内先后建有“贺兰山堂”、“金龙山堂”、“西泉山堂”、“武威山堂”、“铁血山堂”等哥老会组织。

高士秀由于为人豪爽，武功超群，在多次反贪官、反洋人、为人民抱打不平的斗争中，颇有谋略，受到会众拥戴。1900年某月，因磴口天主教堂，外国教主勾结官吏，欺压群众，造成命案，群众愤恨，他亲率数名会众，轻骑前往磴口，夜间潜入教堂，杀死外国教主，一时轰动各地，高士秀从此名声远扬。不久，清政府下令通缉，他便潜隐到陕北、灵州、伊盟等地，秘密联络会众，扩大“洪帮”组织，定名为“贺兰山堂”，会众推举高士秀为“龙头大爷”，上下八部共有十多名

会首，都称“大爷”。如：高登云、马连第、孙学文、芦占奎、金占奎、于凌云等人，以宁夏贺兰山为根据地，取名“贺兰山兴隆堂”、“四海香”、“五湖水”，意为联络全国五湖四海弟兄，各帮会组织“共同举义，立国安邦。”当时“贺兰山堂”活动范围包括宁夏、河东、陕北、绥西等地。高士秀除经常和宁夏河套各堂口积极联系外，并与甘肃的“金龙山堂”，“西梁山堂”，陕西的“通统山堂”，“太白山堂”，“秦凤山堂”有联系，并经常和西安同盟会员张凤翔等人取得联系。

二、参加同盟会，召开岳武庙军事会议

1910年底，陕西同盟会领导人张凤翔及哥老会的头目张云山将他们在西安“大雁塔歃血订盟”的目的和情况，通知了高士秀，并要求高在宁夏积极作举义准备。

1911年8、9月间，兰州同盟会员刘先智（甘肃人）奉命来到宁夏联络哥老会头目，宣传孙中山先生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的革命纲领，受到宁夏各山堂头目的积极拥护，均热烈表示要为“推翻帝制，建立民国”而努力奋斗。同时，宁夏各山堂头目高士秀、刘华堂（铁血山堂龙头大爷）等人，以及个别社会贤达数人，随加入了同盟会。他们秘密联络会党发动民众，并到大小礼拜寺、余家营等回民聚集的地方进行串连活动；同时，在清军内部，亦进行瓦解工作。这样，地处边陲的宁夏地区，也和全国一样，孕育着革命的火焰。

1911年10月下旬（农历九月初）陕西同盟会为配合和响应十月十日爆发的武昌起义，于十月二十二日也树起义旗，占领

了西安，组成了陕西革命军政府。西安“通统山堂”龙头大爷，陕西新军都督张云山，即以鸡毛信急速通知宁夏“贺兰山堂”的大爷高士秀，促其迅速举义，作为侧应。

高士秀、刘先智见信后，立即在城东岳武庙召开各山堂大爷紧急军事会议，研究决策，要求各山堂从速准备，组织会众，决定十一月十五日（农历九月二十七日）各地同时举事，会上规定了军纪：“严禁杀戮，封府库，保闾阎，不扰民，不许奸污妇女，如有违者梟首示众。”会议推举刘先智（同盟会领导人）、高士秀为义军正副总指挥，并决定兵分东西两路。考虑到灵州是通陕北、下关中的要衢，战略地位重要，加之高士秀、高登云多在该地活动，并与当地回民头目亦有交往，故决定高士秀、高登云指挥东路军。孙学文（孙俭之父）朱邦科协同，以攻取灵州、横城、吴忠堡、半个城（今同心）、花马池（今盐池）等地。刘华堂、刘复太（武威山堂大爷）负责指挥西路军，刘照黎、马跃川协同攻打宁夏县（银川老城）宁朔县（小坝）、平罗、磴口、中卫等地。

三、东路民军起义

根据“岳武庙会议”的部署，高士秀、高登云等首目，立即来到灵州，于十一月十四日（农历九月二十六日）夜，召集帮会首领数十人，在王保子（哥老会人）的小商号内，由高士秀主持开会，传达武昌、陕西各地举义的消息和目的，要求大家共举大事，研究了灵州地区清军的兵力部署和险要等情况。并就起义的军事行动作了具体部署。会议决定：由高登云、马连第就地组织会众举义，攻战灵州城，朱邦科、孙学文攻占金积堡和董府。高士秀则亲率部分会众直取横城，拔除援

军据点，并与郡城义军相呼应。会上高士秀、高登云勉励大家以革命大局为重，遵守堂规，同心协力，大干一番；并申明军纪：不准贪财劫物，妄杀群众，奸淫妇女，违者斩首。

阴历九月二十七日（十一月十五日）义军兵分三路：高登云聚集会众百余人，首先攻打灵州参将衙门，由于朱参将原系哥老会弟兄，未有抵抗，在朱的影响下，官兵很快投诚起义。这样，义军未动一刀一枪，便顺利占领了参将衙门，夺取了武器弹药，并收编了一部官兵。城内贫民闻讯，纷纷要求参加革命队伍，民军锐气顿时高涨，一鼓作气扑向州官衙门，经过短时交战，占领该衙。接着打开监狱，放出囚犯，火烧州衙，守备潘××和州官余重基仓慌逃跑。高登云又率众扑向灵州税局，杀了民愤极大的杨姓局长，刀伤师爷王文炳，并没收了税局和两个豪绅的当铺。一夜之间，灵州城完全控在义军手中，其部众迅速发展至一千余人。同时，朱邦科、孙学文率领的另一支会众与清军巡防营内的会众里应外合，于当晚亦占领了金积堡。

横城居河东水路交通要道，为灵州和郡城之门户，清军驻兵抗守，高士秀事先派出精干会众数人，化装入城，联络内应。傍晚亲自率全部会众，星夜分散，奔往横城，并与清军中的哥老会人取得联系，乘清军未备，里应外合，于黎明前占领了该城，守横城的都司不战逃跑。义军缴获全部武器马匹，收编了大部清军官兵，该部顿时成为一支人马齐全的劲旅。如《朔方道志》记载：“武昌起义，陕西各省响应，灵州会匪高士秀、高登云等逆，乘机作乱，于九月二十七日夜，纠集千余人，先攻守备署，劫取军械，旋入州署，潘守备及署知州余重基均逃匿，灵州陷。”

灵州光复后，民军于二十九日召开会议，宣布成立军政府，

开始整编部队，所有义军暂编为五个营，贴出民军起义后的第一个安民告示。大致内容为：“奉支那革命大元帅孙谕……各省起义，驱除满清，推翻帝制，建立民国。……第一保商，第二护民，回汉等教，一视同仁。不准谣言惑众，不准抢劫奸淫，凡我军民，其各凛遵，倘敢故违，定予严惩。”至此，义军所占地区，秩序井然，军民相安。

四、西路民军起义

宁夏镇台张绍先，听到陕西、各省纷纷起义，宁夏会党秘密活动，惊慌失措，借请示军宜为名，于十月下旬前往兰州述职。郡城和满城，戒备森严，日夜巡逻。灵州地区起义的同时，宁夏西路地区，由刘先智、刘复太、刘华堂召集会众，组织义军，分兵四路，在刘华堂等头目的带领下，于十一月十五日傍晚九时，主攻郡城（银川旧城），与清军激战数小时，由于负责第四路主力巡防续补五营的牟宪章（原清军左旗之官）怀有二心，动作迟缓，未有及时策应。加之刘华堂、刘先智指挥不周，民军武器劣势等原因，郡城攻克不下，最后民军被迫退至城北八里桥一带。

首次起义虽未成功，但有力的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。宁夏道台孙廷寿，代署总兵贺明堂，知府庆隆，守城都司多伦岱，宁夏县知县陈元骧等，个个丢魂丧胆，惊慌万状，急调新城骑兵，增强城内防务。

退居八里桥的民军，得到灵州、金积、横城光复的消息，军心大振，勇气倍增，经过三天的休整补充，决议再次攻城，并分兵六路进击。十一月十九日（农历九月二十九日）晚，各路民军按指定路线开始行动，经过一番迅猛急进的战斗和城内

会众的配合，终于里应外合攻入城内，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。斯时，城内贫民数百人亦纷纷参加义军，奋起助战，配合民军烧当铺、砸监狱，纵火烧毁县衙，经过一夜奋战，击毙守城清兵数百余名，余皆溃散。如《朔方道志》记载：“左营游击贺明堂，守城营都司多伦岱，理事同知文升皆死之。”又“宁夏道台孙廷寿、知府庆隆均逃匿民间，知县陈元骧被民军追斩于立岗堡。”民军占领道台知府衙门后，在钟鼓楼树起大旗一面，上写“支那革命大元帅孙”八个大字。并下令城乡各户门口上方，均悬挂一面红色三角小旗，上写“顺南”二字，以示拥护孙中山，响应武昌起义之意。

同时，宁朔县知县高彝（平时与帮会已有密切联系）当听到郡城已被民军光复，随带领全县文武官员，向民军投诚起义。

是夜，南路民军亦先后占领了大坝、叶盛堡、玉泉营等城镇。北路民军亦同时分别在平罗、宝丰、黄渠桥起义。平罗会首王致宾同时举义，平罗县知事李九波被士绅（吴大炳）藏匿，民军仅此一举光复了平罗全境。阿拉善旗的哥老会，也联合当地伐木工人，树起了义旗。中卫广武地区亦由民军与会众配合起义，向清军包围袭击，防御官秀英，顽固拒降，经终日血战，秀英被民军击毙，清军溃散，广武随告光复。

郡城（宁夏城）第二次起义成功后，军政府为了尽快招降满营的清军，利用原任道台孙廷寿进行影响，暂推孙担任宁夏军政府大元帅，推刘先智、高士秀、高登云、刘华堂、刘复太、刘照黎、孙学文等九人为军事委员，负责军政府革命武装的组建工作。十一月二十三日（农历十月初三日）“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”宣告正式成立。

民军光复郡城之际，盘踞满城（郡城西十余里处）之清军

步骑兵尚未正式投诚。由于民军轻信满城中清军内部帮会首领假投诚起义的许诺，再加军政府内部组织不纯，大元帅孙廷寿，心怀二志，看风转舵，会首中又有内奸牟宪章的阻挠，未能一鼓作气，趁胜进攻，故而丧失战机。军政府成立后，会党领袖已识破这是清军缓兵之计，随于十二月二日（农历十月十二日）开始围攻满城，满城守将常连，早在民军内部有奸细，得知民军底细，恃装备优势，进行殊死反抗。民军为消灭满城之敌，奋力进行攻坚战斗，双方相持竟达二十余日之久。在战斗中，刘先智（同盟会领导人）身先士卒，奋不顾身，不幸壮烈牺牲。但满城终未攻克，遗患未除。

五、清军反扑，宁夏、灵州民军转移

灵州、宁夏的光复，不仅粉碎了清军妄图以西北为根据地负隅顽抗，进而反扑中原，力保满清王室的阴谋，而且也扰乱了清军围剿西安起义民军的部署。陕甘总督长庚，陕西巡抚升允，不得不分兵扑向宁夏。他们调令甘肃提督马安良，所部帮统循化营，参将马麟、马麒及分统马政，兼游击马占奎等，带领马步七营，水陆清军进犯宁夏。逃到兰州调兵的宁夏镇台张绍先（回民）也率部分人马回到中卫，攻占广武，利用宁夏回汉隔阂和豪绅与会党的矛盾，地主官吏组织地主民团。如金积马学文、董大人（董福祥后裔），吴忠马玉书、张四（张俊后裔），灵州城南王玉赞、王生元等豪绅组织的民团一千余人，还有沙沟马仁武、马广武的崇义民团一千多人，都愿听张绍先调遣，为清廷效力。

十二月中旬（农历十月下旬）清军分东西两路，水陆并发，进犯宁夏平原。西路由马麟、马麒等率西军骑兵沿黄河西

岸直趋宁夏。步兵由张绍先率领乘船筏直扑横城。东路由西军李自正部（后为马福祥左营营长）协同张绍先三子（时称张少大人）带领本部步骑精旅和河东豪绅的民团数千人扑向灵州。

高士秀在横城，担负着和郡城与灵州义军的联系，以准备随时接应。面对清军的反扑，他建议刘华堂，通知灵州高登云“能守则守，不能守就东撤。”但这个正确战略撤退，并未使各头目所接受。灵州民军在高登云的指挥下，奋勇杀敌，重创清军，一次又一次的粉碎了清军的进攻。清军昼伏夜击，以及采用许多攻城措施，都未能得逞。虽然一时守住了灵州，但民军损失较大。

与此同时，西路清军步骑势众，十二月十七日广武失守。义军撤至叶盛，接着叶盛也被清军攻破。年底，清军进展到满城解围，民军遭受里外夹攻，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民军不得不放弃满城，撤回郡城。清军将宁夏城从东西南三面围住，城中首领刘华堂、刘复太，坚持固守城池，以待外援。在对垒战中，民军奋勇杀敌，清军尸骸遍地，曾一度后退。但民军伤亡很重。后来由于清军的离间，孙廷寿原就心怀二志，此时，张绍先率援军围城，孙积极准备叛变。元月三日勾结牟宪章率部叛变，开放城门，并诱捕民军首领刘复太、夏梓、袁宗明、李花麻儿等十余人。军政府中剩余的革命党人，北撤被迫转移。并通知高士秀部往鄂尔多斯的罗布台接应。（此时高士秀已撤往三边）。马麒军占领城池后，敞刀三日，大肆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城中民众深受其难。孙廷寿、牟宪章以“清朝命官而置之”。

当清军分两路向灵州、郡城反扑之际，清军宁夏镇台张绍先于十二月二十日率所部及西军步兵数千名，分乘船筏数十只，直取横城，占据黄河渡口两岸，切断了和郡城、灵州的通

路，将横城守军包围，用炮火猛攻。高士秀看到清军大兵压境，灵州郡城也朝夕难保。面对军事形势的巨变，再迫于敌我力量的众寡悬殊，当时横城、灵州虽有民军二千多人，但多为临时聚众，缺乏战斗经验。武器中除个别开花炮和来复枪外，多数是大刀长矛。而清军不仅人数众多，而且武器优良。西渡解围郡城，已不可能。为了保存民军实力，必须撤离横城，以南路袭击援敌，解围灵州，以图再起。高士秀经奋战两日，突破重围，撤离横城，到金积、吴忠阻击犯军，并转战花马池（盐池），打败该城守备赵玉秀、千总刘怀芝所率的侧击部队，并命灵州高登云部，立即转移定边，能与正向陕北开赴的西安民军井勿慕会合。但高士秀转移到三边后，又接到军政府已经撤往磴口，令他率部北上到罗布台接应的命令。高士秀复率所部民军回头北上，又向鄂尔多斯蒙地进发，以争取在罗布台与刘华堂部会师。

高登云带领民军，虽然粉碎了清军及民团多次对灵州的进攻，但民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清军连日攻灵州不下，一面派绅士进城议和，一面积极准备攻城工具。这时，民军头目马连第看到清军势力强大，发生动摇，自以为光复灵州时，他曾暗中保护过州官余重基，一心主张同清军讲和。加之这时宁夏、横城的义军均已撤走转移。因此，高登云接到高士秀二次命令后，才急速突围，向陕北定边开发。

当民军撤出灵州时，民军头目马连第，认为自己主张议和，有功于清军，留而未走，但余重基（州知）首先献出马连第是反叛头子，结果全家数口，均遭杀头。

清军对城内百姓，更是任性残杀。凡认为哥老会人，格杀不留。不少百姓，全家杀绝。借搜杀会党，任性抢掠奸淫，造成灵州史无前例的浩劫，遇害群众约在五千人以上。就连马福

祥修编的《朔方道志》也记载不讳：“清军兵团入城，杀掠甚重，故民间有兵不如贼”之谣。

高登云率部到达陕北定边后，高士秀此时又已北上伊盟。而西安井勿慕部，则还未到达，该地郑士诚虽为陕西义军首领之一，但此人政治不纯，极为奸诈、野心勃勃、排除异己。一方面欢迎接纳、一面暗中在定边砖井子四周设下埋伏，对高军进行突然袭击。仓促之际，无法应战、军不成旅、各自散失，高登云左臂负伤，只身逃遁。后隐居于盐池、定边一带，默默而终。

宁夏城陷后，刘华堂等民军领袖率部向平罗、石嘴山方向撤退。沿途与追击的西军浴血奋战。民军失散很多。到了石嘴山后，民军进行整编，决定以刘华堂、高士秀分别为东西路正副督指挥。刘华堂率军东渡，撤至鄂尔多斯的罗布台（今巴音高勒以东），高士秀奉军政府令，已向西北转移至罗布台正南三百里处的拉僧庙。即派前哨民军速往罗布台同刘华堂部联络。不幸的是：当刘部到达罗布台时，清军提前派蒙古钦差诚寿，勾结当地王公贵族，纠集蒙兵千余，提前分散埋伏，于1912年元月20日晚，趁民军初到疲惫之际，假意设宴款待民军。宴会上民军首领皆中埋伏，被围困在一起。刘华堂、刘照黎众头目大多遇害。深夜民军在酣睡之际，被蒙兵包围，刀枪齐发，民军猝不及防，除部分突围，一部北去后套；一部南向，被高士秀接应外，余遭杀害。高士秀部长途跋涉，久已疲劳，加之深入蒙地，此时已成孤军，粮弹均缺，为避蒙汉冲突，因此被迫退回陕北。

1912年元月，正当南京革命军政府已经宣告成立、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的时候。而盘踞在西北的满清反动头目、陕甘总督长庚，还选派皋兰县知事陈必淮（原两任灵州知府）率镇

北三营，于元月十五日抵宁夏。升任知府。以办理善后为名，大力瓦解民军会众。并增派清军扼守石嘴山、花马池等处，严防民军出入。从此，轰轰烈烈的宁夏辛亥革命民军起义，被清军反扑而失败，仅有的一支革命力量，退居到陕北。

六、高士秀组织塞上义军配合讨逆护法斗争

（一）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的来历。

1911年冬，陕甘民军起义后，满清陕甘总督长庚，还调效忠于清朝皇室的西宁建威将军、巡防统领马福祥父子，前往陕甘边境镇压。马福祥积极为清廷谋划献策。1912年3月瓦解了天水地区的民军起义，随后由于清朝内阁总理北洋军阀袁世凯心怀不测，威逼溥仪下台，南京革命政府议和，当了临时政府大总统。马福祥父子见清王朝大势已去，便慌忙表态，投机共和，听从北洋政府袁世凯调遣，于1913年春调到宁夏。如马鸿宾在《朔方道志》《新室记》（护军使署）自供不讳说：“辛亥革命，黄钺独立秦州，余随叔父前往解决……事定，即班师。民国建元，宁夏匪乱初靖，叔父以阿尔泰护军使移镇是邦。循河道入觐（谒袁世凯）诱擒王德尼麻于汇德城（今临河县）。生致京师。大总统以为能，任命宁夏护军使兼宁夏将军、节制鄂（托克）乌（审）阿（拉善）三旗，添练甘肃新军，以余为新军司令。”这位效忠王室、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刚刚脱掉了满清朝服，换上了民国礼服，打着新军旗号，身为共和政府的新军，诬蔑为“匪”，大肆镇压，赶出宁境。而把反对共和镇压革命的宁夏满营，说成是“拥护共和，赞襄革命”。因之，

宁夏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，随被北洋封建势力所篡夺。

（二）高士秀联络陕西革命党人讨袁。

宁夏辛亥革命军政府，虽然遭清军反扑而复灭，影响全线失败。但以高士秀为首的一部分民军仍然保留下来。他们始终和陕西会党和同盟会领导人，保持着组织上的联系。转移到三边后直接又接受了陕西革命党军政府、陕北新军组织的领导。做为革命党领导人之一的高士秀，他始终奉行孙中山先生“建立民国，实行三民主义”的政治纲领，并为“光复宁夏”这一政治目的，直接和袁世凯调到宁夏的“护军使”北洋军阀马福祥展开了殊死的搏斗。

1912年2、3月间，高士秀部民军转移到陕北。自称本人“故乡定边”。接受了陕西军政府。陕北招讨使井勿慕（原同盟会员）的领导。1912年夏，孙中山辞去大总统出国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，此后革命失败，北洋篡权，但他“未尝须臾忘宁夏也”。

1914年在反袁声中，他派芦占奎联络甘肃环县会党领袖张九才，同时派金占奎（同心回民）到后套组织失散在各地的原宁夏会众，就地举义，发展革命力量，以图东山再起，从南北两路直取宁夏郡城，消灭北洋军阀。

1914年环县会党头目张九才曾在陇东举义，马福祥增派步骑协助陇军镇压，如《马护军使德政碑》记载“民国三年，公还自京师，值犯匪乱甘。烽火亘天，城市邱墟，公派队追遭并布守防。贼难蹂躏，窥向宁夏”。

1915年8月间（民国四年夏）张九才在芦占奎的协助下，率领群众，击败环县陇军，杀死县知事，占据县城，转攻庆阳。焚烧教堂两座，陇东告急。马福祥又派马福寿部“劲卒千余人”

增援，高士秀随率本部人马离三边，日夜兼程，前往花马池、惠安堡、西川一带截击，接应环县义军。并与张九才部会合，击败了宁陇大军的合围。立即回师北上，进驻半个城，花马池、定边一带。随后又派芦占奎率精骑驰往后套，与金占奎部迂回作战，发展义军力量。如《马护军使纪功碑》记“卢酋乃窜走沙漠，合张九才之众，攻陷环县，扰定边，冀以土匪高士秀焰复张，公分兵疏捕，截之为二。卢占奎北颺，匿后套中”。

1915年秋冬之间，北洋军阀袁世凯又积极策划复辟称帝，12月25日云南革命党人蔡锷、李烈钧、唐继尧率部组成“护国军”打出反袁旗号，宣布云南独立。高士秀以及在陕北的革命党人，首先响应，纷纷组织民军起义，参加护国之役。陕西革命党人于右任、胡景翼、井勿慕等人组织了陕北讨逆护国军，于右任担任总司令，井勿慕任副总司令，井岳秀、高士秀都参加了护国军。1916年夏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三原宣布陕西独立。自任陕西都督，进军西安。

（三）高士秀策应五原起义

1915年九月五原地区会党头目弓占元，在东皮房率众起义，以狼山为根据地，聚众数千人。并联络转移到后套一带的宁夏民军，首目金占奎和蒙古会党头目白彦公、达赖公各部，积极在各地举义。北洋政府调绥军和宁军围剿，马福祥派统领“新军中将司令”马鸿宾入后套镇压。起义民军于九月底在后套科布尔和惠德城（临河）击败马鸿宾部。与此同时芦占奎所率精骑已到后套，他们互相配合，先后占领五原、萨拉齐、察毕齐、和林、托克托、东胜等地。马福祥惊慌失措，曾亲自率劲旅到后套协助绥军，指挥镇压义军，北洋政府为此给马福祥加冕“会

办包绥军务”。如《甘军援五原表功记》“民国四年，绥匪肆扰，行踪飘忽，后套千里，一片贼氛”，“是冬匪复出狼山上犯，汉匪卢占奎、金占奎，蒙匪白彦公、达赖公等复约合三边匪党分扑和林、东胜、萨托克托、略萨拉齐、坠察毕两县。麾城扞邑，英之敢膺。公奉会师包绥之命，跼霜蹴雪，诸出杀虎口，直抵包绥。丙辰二月，犁公胡洞贼巢，贼夺途鼠窜，公星夜跳驱，邀败之苏海口，再挫之石拉干，贼势不支，遂弃五原而遁。”

（四）昭化庙突围战。

1915年秋，高士秀、张九才，得知后套的义军连捷，革命力量发展迅速，并已决定渡河来攻宁夏郡城。高士秀便取道乌审旗，北上接应。途中误中诡计，恍报灵州、郡城空虚，高士秀随改变行军计划，兵分两路，令张九才北上，经鄂托克接应取横城，亲自率部西进，迳取灵州，由于奸细走露分兵消息。马福祥急调“宁夏统将”马福寿、南营长马腾蛟及护军参谋余鼎铭、董尕南等布阵合围。1916年元月，高士秀率部从乌审向西挺进，宿营到鄂托克境（定边北）的昭化庙（又称昭皇庙、交通孔道）。误入陷阱，深夜突然遭伏兵奇袭，炮矢齐发，义军猝不及防，宁军纵火烧庙，炮火冲天，高士秀身先士卒，短兵相接，以一敌百，杀退东南两路围敌。义军奋勇结队，杀出重围。双方伤亡惨重。虽然攻取灵州计划失败，但是役歼灭宁军头目甚众。如《马护军使纪功碑》记“高士秀踞乌审属之昭化庙，公檄陆军中将马静庵、福寿、衔枚夜蹕二百里，围其庙，贼方熟寝帐而斗，纵火焚之。抉门闯窬，骸骨撑柱，士秀狂猿，仅以身免”。又《昭化庙烈士殉难碑记》说“与贼乱斗于火中，尸骸狼藉，蹂躏其上，亦云惨矣”。“阵